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布哈林论稿

郑异凡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哈林论稿/郑异凡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4

ISBN 7—80109—159—0

I. 布…

II. 郑…

III. ①布哈林, H. H. —人物研究

②布哈林, H. H. —思想评论

IV. K835.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920 号

布哈林论稿

郑异凡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 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430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 册

定 价:26.40 元

序 言

布

哈林是列宁以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著述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以至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并且可以说,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但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著作长期被打入冷宫,对他的活动和思想的研究成了禁区。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了布哈林这一段是不完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缺了布哈林的名字就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空白。

大致从 50 年代起西方开始了布哈林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理论界和历史学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了历史的反思。人体解剖是猿猴解剖的钥匙,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浩劫以及对浩劫的反思,非常有益于理

解苏联历史上所发生的种种反常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从70年代末开始的对布哈林的再认识，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88年布哈林在苏联获得政治上的平反，然而政治平反只证明此人不是特务间谍，不是“人民公敌”，并不能表明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最多只是恢复了历史的公道，为恢复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正式除去了紧箍咒。对于布哈林的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档案资料使用的限制，认识上的局限性，布哈林研究仍未穷尽一切，大量问题仍有待深入。

在中国人学的外国史中，可以说，任何国家的历史都不能同苏联史，特别是联共（布）党史相比。我们国家有几代人曾孜孜不倦地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认真掌握这部“百科全书”的内容，学习它所提供的经验，把它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搞社会主义只有这个唯一的本本可学，在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当年苏联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中国的唯一选择。然而，历史教给中国人民，联共的这一套经验带来的是灾难，是普遍的贫穷，是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当然不能把自己的过错全都推给别人，但苏联模式的弊病是其中的主因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搞社会主义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呢？经过十年的动乱之后，学者们开始了新的探索。人们发现，历史上就存在过同斯大林模式不同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而就人物而论，布哈林在其时代就曾经同斯大林模式展开过激烈的抗争，他所捍卫、阐述和发展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与斯大林选择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布哈林提供了另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模式：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有机的长入过程，应当把重心从抓阶级斗争转向文化经济建设，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决不能再发动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否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布哈林并不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他反对单纯采用机械的镇压办法，主张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斗争。要采取富民的方针，提出“发财吧”的号召。社会主义需要高度的民主，要建设“公社国家”。与此相应，布哈林还提出一套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运用价值规律、市场机制，采用经济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经济管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互相繁荣、互相促进作用，用竞争，而不是查禁的办法逐步排挤资本主义成分。布哈林不讳言俄国的落后，他承认俄国是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从俄国的国情出发，提出“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是用暴力，而是以经济利益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政策上，同样反对发号施令，主张展开作品之间的竞争，无产阶级通过作品的竞争，赢得领导权。布哈林的所有这些主张并非另搞一套、自作主张，而是对列宁的晚期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多的几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至文学艺术、新闻学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先于列宁对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独创的见解。他首先对过渡时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过渡时期经济学》。他在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情况下，挤时间编写了体系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了他的著名的平衡论，其中闪耀着十多年以后才为世人所知的系统论思想。为理论宣传的需

要，他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撰写了解释俄共（布）新纲领的《共产主义 ABC》。他在同斯大林争论中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还提出了“短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当法西斯在欧洲露头的时候，布哈林立即敏感地觉察到它的危险性，此后不断地予以揭露和谴责。他在“自己的”监狱里给我们留下的《哲学短篇集》，更是值得后人仔细研究的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布哈林是列宁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不研究布哈林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将是不全面的。

中国的读者尤其需要了解布哈林，研究布哈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最早送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手中的是哪几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呢？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二本就应该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 ABC》了，这本书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革命家，它的传播要大大早于斯大林的著作。当然，对中国革命起极大影响的还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它的影响是不能同前两本书同日而语的。不仅如此，布哈林的其他著作在 20—30 年代也对我国的知识界有过巨大的影响。例如，我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源于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这样一位思想家、理论家，我们必须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无法说清楚。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有一个缺陷，就是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传播，而忽略了他们的同时代人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这样的研究是欠完整的，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并发挥其巨大作用的全貌。布哈林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还不仅仅限于思想理论的影响，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

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哈林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来说，布哈林提出或捍卫的上述发展模式和建设模式，有不少东西是可供借鉴的，至少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如果说在 20 年代苏联的发展已经存在多种选择，那么时代发展到 20 世纪末，我们有更多的根据走自己的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在这过程中，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他反对左倾激进主义的斗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布哈林在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的失败，标志着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斯大林模式的开始。斯大林模式的确立是布哈林的悲剧，不仅是他所捍卫的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悲剧，也是苏联人民的悲剧。本世纪初，俄国革命阵营里曾经有过“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争论（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最初译作《做什么》，是很贴切的，反映了当时争论的内容）。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争论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争论。历史学家也许很难告诉读者“做什么”，那是理论家的任务，但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已有的实践教训，指出“不做什么”，即哪些事是不应当做的。总结苏联 30 年代的实践，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使后人不再重复人家的错误。

本书是作者从 70 年代末起研究布哈林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由于国内目前已有多种布哈林传记问世，因此本书把重点放在对布哈林理论观点的研究上，大致勾画了布哈林的理论思想的发展历史。但是作者始终认为，对布哈林理论观点的研究必须同他的实践，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以便看到该理论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其局限性何在，尽可能避免夸大和苛求。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先查明事实经过，例如 1928—1929 年间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布

哈林之死等章节，作者有意对事件的历史进程作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和判断。对待人类的文化遗产的态度，作者很同意一种主张，即把重点放在继承吸收上，而不是否定排斥上。人类的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当然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基于这一原则，本书以较多篇幅介绍了布哈林的贡献，即使在一些错误较多的著作中，作者也力求既指出错误之所在，说明错误的原因，同时发掘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希图囊括布哈林的全部理论遗产，对他早期的经济著作（如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的著作），他后期关于科研规划的论述，他在 30 年代的著述，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特别是他同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等，都未能展开阐述，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了。

布哈林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序言中声明：“作者的口号是：精心思考，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一本研究布哈林的著作理应遵循布哈林的这一实事求是的口号。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布哈林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文献信息部的大力协助，查阅和利用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所藏档案文献，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列·德·希罗科拉德、伊·奥·列金娜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布哈林著作和资料，借此机会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6 年 4 月于北京北太平庄

布哈林传略

布

哈林全名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9月27日(公历10月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自幼聪慧过人,四岁半即能读会写,小学毕业时是第一名优等生,在中学期间几乎门门拿5分。兴趣广泛,在父亲伊凡·加甫里洛维奇的影响下,从自然史、文学史直到反宗教的书籍,抓到就读,还在完全是个孩子的时期就读遍了古典作家的作品,海涅的诗能倒背如流。这种兴趣使他后来能够成为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他也喜欢自然科学,曾热衷于搜集甲虫、蝴蝶标本,少年时代的梦想之一是有一本《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及达尔文的著作,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后来甚至得到大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赞扬。他喜欢绘画,从现在看到的他的油画遗作可以看出,他的绘画造

诣是相当高的。1912年他正是被当作青年画家介绍给列宁的。

上中学时期，布哈林开始阅读地下报刊和著作，参加有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学生组织。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处是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布哈林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1906年下半年莫斯科武装起义遭到了失败，革命形势恶化，反动势力大肆逮捕革命人士，正是在这关头，布哈林毅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促使他作出这种抉择，最终归属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它那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相形之下，“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此外自由派的行径也使他产生激烈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情绪。入党后布哈林开始在莫斯科河南岸区担任宣传员，1907年春在中学毕业考试期间，同他的同学，后来的著名作家伊里亚·爱伦堡一起在斯拉德科夫壁纸厂发动了罢工。

1907年秋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学专业，利用大学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进行秘密接头。190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增补布哈林为委员，次年，被选入新的莫斯科委员会。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区担任组织员、宣传鼓动员。在反动时期，党内外知识分子中间在哲学思想上出现一种反动思潮，造神派、寻神派、经验批判主义盛行一时。布哈林本性是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人，这时候自然“对经验批判主义者有某种异端的偏爱，并且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看来，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接受了波格丹诺夫的某些思想和术语，这种影响直到他写作《过渡时期经济学》仍然可以感觉到。对波格丹诺夫的作用，布哈林始终不是完全否定的。其实，列宁对波格丹诺夫也是

一分为二的，把他的早期同后期分开。1928年波格丹诺夫因在自己身上做输血实验而牺牲后，布哈林在悼文中说，波格丹诺夫是“在我党发展中和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中起巨大作用”的一个人。^①

但政治上布哈林始终是坚定的，始终是一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既不是召回派，也不是调和派。

1909年5月23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后被释放，此后还曾被捕过一次。1910年在合法机构中从事党的工作，同取消派进行了斗争，还参加工会刊物的工作。1910年底莫斯科组织遭破坏，布哈林又一次被捕，在狱中关押了几个月，然后行政流放奥涅加，不久从那里逃亡。

1911年10月来到德国的汉诺威，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布哈林后来总结流亡生活时认为有三大收获：一是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图书馆，从而积累了“学术资本”；二是认识了列宁，受到巨大的影响；三是掌握了多种外语，获得了丰富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

1912年秋，布哈林在克拉科夫会见了列宁，列宁建议他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此后布哈林一方面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他曾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开姆尼茨代表大会。

1912年冬至1913年移居维也纳。在这里他一边在维也纳大学听著名的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同时写文章批判他们的观点。他写了《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批判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和柏姆-巴维克的观点。老一

^① 《真理报》1928年4月8日。

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同民粹派斗争，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市场问题和土地问题上。和前辈不同，布哈林直接涉足最新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同其心理学派和折中主义做斗争。他是最早批判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对边际效用学派的批判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参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为之起草演说、报告等等。

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收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哈林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林茨被警察当作奸细逮捕，由于私交颇为不错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作证，得以获释，随即被押送到瑞士边境。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洛桑逗留期间，他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学派以及洛桑图书馆里的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考察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1915年7月布哈林取道法国和英国，辗转来到瑞典。同以后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青年派”建立联系，为其机关报《警钟报》撰稿。当局因布哈林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把他当作“炸桥”、“扔炸弹”的“列宁的间谍”逮捕，驱逐到挪威。在挪威他参加“青年派”的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不久转移到丹麦。在1916年的5个月里，布哈林在挪威《阶级斗争》周报上至少发表了13篇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文，12篇其他内容的文章。1916年10月秘密赴美国，在这里参加了《新世界》的编辑工作，该报原先立场动摇，自布哈林到达以后革命的国际主义明显地占了上风。布哈林还到各城市做宣传旅行。

这一时期布哈林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5—1916年他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书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分别探讨了国际垄断组织（如辛迪加、卡特尔）、金融资本、资本输出、殖民地争夺与分割世界的斗争等等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在于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涉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后来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时显然吸取了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对它的国家制度及其发展前途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写了《论帝国主义的国家理论》的长文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多篇短文。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遭到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分子的粗暴歪曲，布哈林认为有必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批判社会爱国主义，他在文中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同时，也要“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国家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家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但分歧存在的时间很短，到1917年列宁自己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

大战期间布哈林同列宁的真正分歧是在最高纲领和民族问题上的分歧。当时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时期已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直接提上日程，俄国面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已不能独立存在，民族自决权已无必要，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布哈林在自传中说，“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而列宁则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认为俄国当前的任务是进行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获悉革命消息后，布哈林立即取道日本回国。在归途中布哈林也没有停止革命宣传，在车里雅宾斯克就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而被孟什维克逮捕，回到莫斯科后，当选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参加过国务会议和民主会议，是莫斯科市杜马代表，在当时的莫斯科组织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激烈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夕反科尔尼洛夫叛乱中起了重大作用。布哈林坚决反对党内在起义问题上的动摇，是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成员，主编起义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布哈林等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莫斯科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被调到彼得格勒。1917年11月29日（公历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曾专门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布哈林本人要求摆脱经济会议的工作，专门从事《真理报》的工作。会上有不同意见。列宁希望布哈林从事经济工作，他说：经济会议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因此需要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所以他坚持不把布哈林列入《真理报》编委会。斯塔索娃认为，经济会议是极端需要布哈林的，但《真理报》更需要布哈林，对经济会议进行思想领导同《真理报》的工作并不矛盾，他反正也不

适于组织工作。经表决，布哈林进入了《真理报》编委会。^① 在以后的 10 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抓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工作，编辑党报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没有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这使他能较为集中地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在各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权关于结束战争的建议以后，苏俄开始同德国和谈。鉴于苏俄经济破坏、士兵厌战、军队瓦解，列宁主张尽快同德国达成协议，缔结哪怕是屈辱的和约。当时持极端激进观点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同德国媾和。他认为拯救俄国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特别是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俄国必须用革命战争的烈火点燃西欧的革命。其实，在指望国际革命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知道，为了保存俄国这个国际革命的基地，必须用空间去换取时间，赢得喘息时机，以便积聚实力，东山再起。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的言行，使苏维埃政权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经济方针上，布哈林等人也持“左”的观点，认为不能对资产阶级让步，更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勾结，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他们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企图用立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布哈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18 年 7 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曾代表左派共产主义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52—153 页。

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宣布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布哈林本人也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错误。”

1917—1918年间，布哈林曾多次受党的委托出国。1918年在德国认识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斯巴达克团建立了联系。同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前几天同苏俄使馆一起被驱逐出境。在回国途中又奉命参加出席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苏俄代表团，但仍未被当局准许入境。

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哈林写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一本是《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两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列宁认为，《共产主义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它对俄共党纲“作了极好的解释”。《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揭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此书表明，布哈林是最早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为此书写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此书的“出色质量”，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正确观点，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缺点。这两本书都写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过渡时期经济学》可以说是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所作的理论总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不是布哈林个人的作品，而是时代的产物。

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临近结束，或基本上结束，但军事共产主义却越搞越厉害，达到其顶点。也正是在此时期，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到1921年春，终于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来了一次大爆发。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俄共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有理论修

养，同时也了解当时局势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的政策，承担起阐述、发挥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任务。

他和全党一起作了“冷静的自我批评”，“幼年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破灭，建立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幻想的破灭。他开始冷静地分析俄国的国情，承认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在俄国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对国情的认识，表明布哈林真正抛弃了左的激进立场。

尽管历史上有过争论和分歧，列宁始终给予布哈林以极高的评价。1922年列宁卧病期间曾同布哈林有过多次数深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后来布哈林写进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2年底列宁在重病之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遗嘱”，对党内的6名领袖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给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以极高的估计，说布哈林（还有皮达可夫）是在最年轻的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不过，列宁对所指出的缺点做了很大的保留，他随即补充说，这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此“杰出而忠诚的